

# 从比较研究说到世界史体系\*

——马克垚与中世纪史研究访谈录

张一博访谈整理

---

**【编者按】**马克垚,1932年生,山西文水人,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马克垚长期从事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基础课教学和西欧中世纪封建社会经济、政治和法律制度研究,著有《世界文明史》(主编)《封建经济政治概论》《英国封建社会研究》《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等著作,他从宏观理论层面建构的封建主义政治经济学已成为当前学术界的一大热点。本次访谈主要围绕马克垚从事中世纪史研究的学术历程、唯物史观重要理论、中西比较的理论与方法、文明史书写与反思“西方中心论”等相关问题展开。

---

## 一、唯物史观与中世纪史研究

问:马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接受访谈,您是否可以谈一下早年学习经历,您当时是如何考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

马克垚:我是1951年参加高考,当时觉得自己理工科还不错,就报考了清华大学,没考虑其他志愿。结果落榜清华,我不得不去唐山工学院机械系学习。去了以后我便难以适应,一方面接受不了与心理预期的差距,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学习成绩不好。在中学里我的理科成绩尚可,但到大学就变得一落千丈。我记得刚入学要学习大学物理,每次课堂最后十分钟老师要现场出一道题来考试,我基本上每次是零分。现在我还记得有一道题是说雨伞上掉了一滴雨点,算重力和加速度。这个我还会算,老师又加了一个条件,说雨伞会转,这我就算不出来了。还有一门课叫“投影几何”,我们都叫它“头痛几何”,这段学习生活对我来说非常痛苦,因而想改变一下。我小时候想做文学家,想学着写小说。后来,觉得不行,因为写小说得有生活积淀,我却没有实际生活经验。后来,我想还是要考大学,便退了学,重新参加高考,考上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1952年我进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学习,那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学校里学习氛围浓厚,老师和同学们心气很高,大家觉得共产党厉害,把帝国主义全部赶走了,大家抱着学好本领、建设祖国的愿望一门心思地学。老师教的很认真,我们学的也很认真。

问:您当时如何接触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垚:我入学时的教材是学的苏联的。当时的教材就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我们叫它

---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2021年度重大招标项目“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口述访谈录”(项目编号:LSYZD21013)的阶段性成果。本文内容已经马克垚审定。

《联共党史》。《联共党史》共有12章,其中第四章第二节是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我们还要学习政治经济学,那个时候的政治经济学也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为基础。除此之外,还有政治理论课,当时的风气是学马列、用马列。

问:您当时为什么会选择中世纪史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呢?

马克垚:1956年我毕业,正好赶上党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我就留校任教了。我一开始其实想研究中国古代史,但系里认为我外语较好,就让我去教世界史,而且还是世界中古史。因此,我就将中世纪史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

问:正如您刚才所说,苏联对当时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影响。那么,您在上古和中世纪史研究中又是如何理解和运用唯物史观的呢?

马克垚:我们当时主要是学习苏联教学模式。苏联教材的上古史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古代东方,一个是古希腊、古罗马。古代东方指的就是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古代中国这四大文明古国。当时苏联学者认为,古希腊、古罗马是发达的奴隶社会,古代东方则是落后、专制的奴隶社会。上古史基本就是这样一个格局,当时苏联的一些世界古代史的教材陆续翻译到了中国,比如狄亚科夫和尼克爾斯基主编的《古代世界史》就持有这一观念。马克思本人认为东方社会的一大特征是没有土地私有制。因此,苏联教材认为古代东方有两大特征,一是没有土地私有制,二是人人都是奴隶,也即专制君主统治下的人都是奴隶。我觉得这个观点并不可信,他们很多观点是从西方引入的,很多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的东西被延续下来;而且,苏联的这种看法也有明显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开始反思苏联的史学观点,比如,当时在国内掀起了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在苏联是研究禁区,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学界开始讨论这个问题,英国、法国的一些期刊也发表了相关研究成果。我当时正好参与《简明世界史》的编写,趁这个机会也读了一些国外学者的文章。我记得苏联学者久梅涅夫在《近东和古典世界》中提到,古代东方和古希腊、古罗马的社会形态不是两个阶段,而是两种不同的类型。这篇文章也被翻译成了中文发表在《史学译丛》上,对我们认识世界上古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两类型论逐渐被国内学界接受。

问:您刚才提到了苏联研究中两阶段论和两类型论的讨论对国内世界上古史研究的影响,当时的中国史学界也很关心这些问题。可以说,中国古代史和世界上古史研究中一些问题是具有共通性的,您的研究是否也受到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影响?

马克垚: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五朵金花”(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是国内史学界关注的热点。在涉及土地所有制问题时,他们也会讨论东方究竟有没有土地私有制。我那时读到过侯外庐关于土地制度的一篇文章《关于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些普遍原理》。在文章中,他主张中国古代的土地制度是土地国有制,这在当时引起了广泛讨论。侯外庐引用的是马克思的原著,我就去查了马克思的原文。因为马克思是法学博士,文章中涉及很多法学概念,这些概念我不甚清楚,便又去找外文法学著作学习,但也是一知半解,最后通过自己补课了解到土地制度有法律形式和经济事实两方面的问题。因而,后来我也讨论了封建土地制度所有制形式,并从法学角度分析了什么是“占有”,什么是“所有”,这些得益于那时补课学到的知识。

问:中世纪史研究的经典问题深受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您能否简要谈一下唯物史观对中世纪史研究的影响?

马克垚:唯物史观对中世纪史研究的最大影响在经济史领域。西欧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世纪史研究也是从经济入手,这一点明显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比如,当时的多布—斯威齐之争讨论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他们争论的核心就是生产方式。多布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在英国影响很大。多布认为,封建社会的内部危机瓦解了封建社会,阶级斗争是封建社会发展的动力。他的观点受到苏联很大影响,仍然带有经济决定论的色彩。到后来的“布伦纳辩论”,讨论的核心还是生产方式的变化。<sup>①</sup>

问:您如何看待中世纪史研究和现代性的关系?比如,美国的约瑟夫·斯特雷耶(Joseph R. Strayer)研究现代民族国家起源,一直追溯到中世纪。您如何看待美国中世纪史研究的这种取向?如果借用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罗斯托夫采夫(M. I. Rostovtzeff)“古史现代化”的说法,是否可以把斯特雷耶等人的研究看作是一种“中世纪研究现代化”?

马克垚:关于这个问题,黄春高专门写过文章探讨美国封建主义的学术史。的确如你所述,美国封建主义研究和欧洲大陆封建主义研究不太一样。你刚才提到的斯特雷耶,他将封建主义视为一种管理方式,但欧洲大陆就不一样。比如,法国学者乔治·杜比(Georges Duby)更多从精神和心理层面解释封建主义,而德国学者奥托·欣策(Otto Hintze)则将封建主义分为军事封建主义、政治封建主义和经济封建主义,这里就可看出美国和欧洲大陆研究的区别。不过,这些是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一些研究。到了托马斯·比森(Thomas Bisson)那一代,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比森早年也是追随斯特雷耶等人的研究思路,后来开始反思这种方式,即所谓的“中世纪研究现代化”。比森认为,斯特雷耶等人将现代国家的管理形式追溯到13世纪甚至更早时期,这种观点是一种“时代错置”(anachronism)。因此,比森在20世纪80年代后不再关注政府,而更多地关注领主权。

问:您在多次访谈中提到齐思和对您的影响,也写过多篇文章对他进行悼念、追忆。您是否可以具体谈一下齐思和的研究及观点对您的研究产生了什么影响?

马克垚:齐老师当年研究中国史,尤其对经学研究颇深。我当时给他做助手,他还给我讲过许多考据学的内容。那个时候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很多老师是留洋归来的,他们在国外研究的是中国史,但为了适应国家需要,很多人转向了世界史研究。齐思和懂外语,便让他研究中古史;周一良懂日语,国家又重视亚非拉研究,就让他去研究日本史了。周老师以前跟我说,他一辈子研究亚洲史,但只写过一篇有关明治维新性质问题的文章,他的主业还是在魏晋南北朝史。他们那代人很多是这样,中国史和世界史都很熟悉。例如,吴于廑在美国的博士论文是研究中国的封建制度,后来被翻译到国内。齐思和的博士论文没有翻译,但基本也是讨论中国的封建制度。

齐老师的看家本领其实是考据学,他的《毛诗谷名考》《周代锡命礼考》是很有乾嘉遗风的。我当时也带我去读一些考据学的书,以求对经学史有宏观的把握,然后再循序渐进阅读其他著作。我觉得自己是做中世纪史研究的,和考据学相差甚远,没在这方面下太多功夫,没在这方面学到齐老师

<sup>①</sup> 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史家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在《过去与现在》杂志上发表《前工业化时期欧洲农业阶级结构与经济发展》一文,认为阶级斗争及其形塑的社会财产关系才是影响长期性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一观点引起学界关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大讨论,史称“布伦纳辩论”。关于“布伦纳辩论”,参见关锋:《“布伦纳辩论”及其马克思主义思想史效应》,《学术月刊》2022年第5期。

的看家本领。

齐老师非常重视原始史料,我记得他有一次非常兴奋的跟我说,他买到了英国人主编的中世纪的资料集,被翻译成了现代英语,一些盎格鲁—撒克逊的法典也被翻译了过来。后来齐老师用这些材料写出了一些关于土地制度、庄园制度的文章。我研究中世纪史,不久就发现研究不进去了,因为没有史料,拉丁语也不会且英语也不好。所以,我就去找齐老师,他告诉我怎么学习英语。他说,学英语就是背词典,把英语词典从第一个词背到最后一个。当时学习英语也没什么条件,连个收音机也没有。我们同时也学俄语,俄语学了两年。不过,教我们俄语的老师是刚从教英语改行,因此,俄语学的也不是很精深。

齐老师在中西比较研究方面也非常有心得,但他的比较研究并不是那种“古今中外人天龙鬼,无一不可取以相比较”,而是强调建立在专题研究上的中西会通。这个“通”是要建立在“专”的基础上,首先要由窄而深的专题研究,才能做到会通。比如,他在《周代锡命礼考》中提到西欧的臣服礼、效忠宣誓礼和中国礼仪制度的比较。他晚年那篇《匈奴西迁及其在欧洲的活动》也想做中西互证的尝试。他认为,中国有很多关于北匈奴的记载,而匈奴进入欧洲的活动则见于罗马史家的记载,中西文献的记载是互相衔接的。齐老师这篇文章是想说明欧洲史上的匈人就是中国的匈奴,以证明中西历史是相互影响的。而且,齐老师也计划写一部世界民族大迁徙的历史,从匈奴西迁一直写到日耳曼民族迁徙,可惜他晚年体弱多病,这个计划未能完成。我自己虽也做过一点比较研究,但在比较过程中深感对研究对象了解太少,所以做的很浅。

## 二、史学实践基础上的中西比较

问:您刚才提到中西会通,邓广铭将治史方法总结为“四把钥匙”(编年、历史地理、目录、职官),您也提到过西方的史学研究有类似的钥匙,您如何看待中西史学传统中的这种异同?虽然中西史学研究方法看似相似,但是否还存在一些区别?

马克垚:你刚才提到邓广铭的四把钥匙,我上学的时候其实并没听说过。我当时只看过张之洞的《书目答问》,那本书在当时很热门,不过研究深了也很难,我也只是翻一翻。不过,后来我研究中世纪封建社会,发现需要有目录学、史料、学术史的知识。比如,研究一个问题,你得知道最初这个问题是谁提出来的,怎么演变过来的,要有一个系统的梳理,否则无法回答。

问:您多次提到中国史,尤其是中国社会史的一些研究启发了您对西欧封建社会的思考,比如,陶希圣、瞿同祖、何炳棣等前辈学者借助西方理论和方法讨论中国社会,您也撰写了多篇文章比较中西社会形态。您在《历史研究》1981年第3期发表了关于罗马和汉代奴隶制的比较研究,在《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2期讨论了中西的家国观念,后来您又出版了《汉朝与罗马》一书。中西比较是个高难度却有意义的研究课题,20世纪80年代后学界涌现了大批成果。当下的中西比较研究视野更为宽广,有些文章还讨论了中国与希腊的蛮族观。您如何看待近年这些中西比较的相关研究?以您的经验看,中西比较研究面临的困难有哪些?

马克垚:上一辈学者国学功底深厚,又留过学,中西兼通。除了刚才提到的《周代锡命礼考》中比较周代分封制和西方分封制的不同外,齐思和早年也关注过中西史学的不同。他最初在北平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讲授史学概论,讲义中涉及许多中西比较的内容,例如,中国史书体裁和西方史书体裁



的对比。齐老师指出西洋史体裁兼具中国传统编年、纪传和纪事本末之长,可伸缩自如。早在1929年,他就写出了《先秦历史哲学管窥》,用西方哲学的方法来理解先秦的历史哲学。

齐老师他们那代人的中西比较研究是实践与理论兼具,我自己没什么理论上的修养,主要还是从具体研究中做比较研究。这方面最早的尝试,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历史研究》上的那篇关于汉代与罗马的文章。那个时候我之所以写这篇文章,原因说来还是很有趣的。当时刚刚打倒“四人帮”,思想大解放,无论老师还是学生都非常兴奋。学术界讨论了很多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亚细亚生产方式。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就开始讨论这个问题,在80年代传到了中国,我之前也写过一些介绍性的文章,认为这是一个很新鲜的题目,而且能启发人的思考。我想可以另辟蹊径,就想到从实证方面做比较研究,从实证层面讨论亚细亚生产方式,就想到了这个题目。其实,我国学根底比较差,现在国学根底比较好的还是刘家和老师,我也只知道一些皮毛而已。我对秦汉史还稍微懂一点,于是想深入了解古代奴隶制度,就写了这篇文章。后来这篇文章发表在《历史研究》上,获得了“优秀论文奖”。一同获奖的还有罗荣渠老师的《扶桑国的猜想与美洲的发现——兼论文化传播问题》,罗老师真是大才,理论和实证功底都非常深厚。我记得当时是在北京饭店举办的颁奖仪式,很隆重。那次评选不是个人申报,而是由广大读者推荐,最后编辑部根据大家的意见总结后再发奖,我觉得这是真正的奖。后来,我也跟东北师范大学的朱寰老师一起编写了《亚欧封建经济形态比较研究》,里面有研究日本史、俄国史的学者参与,也算是一种比较的研究。

你刚才提到《汉代与罗马》那本书,其实关于罗马的那部分我已从不同方面写过了,我主要谈谈是怎么写汉代的吧。我的看法是,中国西北一直有边患,从匈奴到蒙古,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没有发展海防的原因。汉武帝是战略家,他除了征匈奴外还发展西南,但他在战术上却是“任人唯亲”,卫青、霍去病是他的外戚。因此,班固的《汉书》说霍去病是运气好,汉武帝把最精锐的部队和最好的后勤给了他,他也没有遇到真正的敌人,他打的都是游击战。当时真正能打仗的,一个是李广,另一个是他的儿子李陵。李广能打仗,不过不受重用。李陵更厉害,打的匈奴难以招架。李陵只有五千人左右,匈奴首领觉得打了那么久还未攻下,后面一定有伏兵,几乎打算撤军。直到俘虏了一个汉军士兵才知道没有伏兵,只有这么多人。最后李陵还是投降了匈奴。我举这个例子,主要想说明汉武帝在战术上处理的不好,如果用李广可能早把匈奴打败了。西方蛮族入侵一波又一波,但维京人之后就没了,这可能和基督教有关。中国则不一样,西北就是草原沙漠带,这一地区一直有游牧民族,这也导致中国塞防的重要性一直高于海防。

对我个人来说,思想上的比较是非常难把握的,我只做一点具体的比较研究,比较朴素。要说中西比较研究的困难在哪里,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做到对两边十分精通,对两边的学术脉络要非常了解才行。

### 三、反思“西方中心论”与文明史书写

问:您在《历史研究》2006年第3期发表文章,讨论了当时流行的几种世界历史书写模式,并进一步反思如何突破“西方中心论”。这篇文章受到了国际学界的关注,被翻译成了德语,收录在弗里茨·斯特恩(Fritz Stern)和于尔根·奥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主编的《近现代历史学家:从伏尔泰到当下的经典文本》(*Moderne Historiker: klassische Texte von Voltaire bis zur Gegenwart*)一书中。

您在文章中提到中国目前的世界史书写依靠的还是从西方经验总结而来的理论框架,没有发展出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近年来,反思“西方中心论”一直是学界热议的话题,也取得了较多成果。但是,反思“西方中心论”也存在着挑战,第三世界的史学近代化基本是在西方史学的影响下发展而来,现在一些著作在反思“西方中心论”的同时可能又落入了另一种中心论的窠臼中。您如何看待对“西方中心论”的反思,以及在反思的同时,我们又应该注意些什么?

**马克垚:**你刚才提到的斯特恩他们编的那本书是一个文选,当时只收录了我那篇文章中的一节。前段时间,德国有个汉学家叫王马克(Marc Andre Matten)联系我,说想把我那篇文章的全文翻译成德语出版。

**问:**是的,斯特恩主编的是一个文选,最开始是由斯特恩主编的,后来他们又出版了修订版,增加了新内容,加入了新文化史、历史政治学等方面的文章。其中有一章是关于世界史书写的讨论,我印象里有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 MacNeill)和克里斯多夫·贝利(Christoph Bayle)的文章,还有您的这篇文章。

**马克垚:**我们的现代史学研究就是从西方来的,这个事情无需回避。我们学西方,同时要从西方的学术话语中挣脱出来,这不是件易事。现在西方也在反思这个问题,比如,加州学派就想打破“西方中心论”。过去他们是用西方的眼睛看东方,我们学了西方的话语,也在用西方的研究看自己。现在我们要跳出来,但并不是说要有个中国中心或东方中心。

当下,我们需要以世界为中心的视角,这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恐怕需要不断的努力。比如,现在中国中世纪史研究已经深入到最底层了,能接触到最原始的史料,利用手稿来做研究,且能梳理出西方关于某个问题发展的学术脉络,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研究路径。以前我们学习西方比较注重实用主义,觉得有用就拿来了,其实也在不自觉地跟着西方走。现在的很多研究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我们根据实证研究发现西方的一些观点是有问题的。西方当然值得学习,但如果丧失了自己的话语,就会变成用西方的眼睛看自己,这样就很麻烦了。

**问:**的确像您说的,现在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一些学者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比如,关于中国专制主义的讨论。我们也认为古代中国是一个专制王朝,皇权高度集中,但专制主义这个概念并不是中国古代就有的,而是近代西方启蒙哲人建构的一种概念。那么,提到反思“西方中心论”,就不得不提到世界史书写,您组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诸位老师撰写了《世界文明史》一书,您能谈一谈为什么要组织编纂这样一套书么?

**马克垚:**要说为什么要编《世界文明史》,这与改革开放后关于文明史的讨论有关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很多学者在反思为什么会有这场浩劫,当时哲学界、文学界有些学者就从东、西文明的角度反思,这和民国时期关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讨论很相似。这类讨论在20世纪80年代非常多,甚至有人觉得是不是我们的文化思维、文化基因有问题,才导致极端事件的发生。但是,历史学界比较清醒,没有这么极端。这主要可能还是历史学界一直有反思“西方中心论”的传统,尤其是对苏联的批评,也是在反思“西方中心论”。历史学界没有怎么参与这场讨论,但后来文明研究成了一个热点问题,因此,要开始写文明史。

那本《世界文明史》,我的主要贡献就是写了一篇序言,也没什么成就,其他部分是历史学系的老师们写的。当时写文明史是依据五种生产方式来写,马克思提出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来说明社会的发展阶段、发展规律,这是一种很有价值的科学理论。限于客观

条件,马克思的理论主要依据的是西方国家、西方社会的历史现实。后来苏联学者把生产方式的理论运用到全世界的历史上,又形成了“五种生产方式说”。在西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现代化理论兴起,一些学者又主张把各个文明、社会划分为传统和现代两个阶段,并用西方现代社会为标准进行衡量。实际上,每个社会的传统与现代都有传承关系,是不可能截然分开的。也有学者批判这种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一些学者就认为传统的形式对现代具有很大影响。无论“五种生产方式说”还是经典现代化理论,其实都是一种单线发展的理论,是用西方标准来衡量世界历史的诸文明。

我们编写《世界文明史》就是想突破这种单线发展模式的理论,当时还是有点冒险的。我们是根据生产力变化来划分文明发展阶段,各文明的发展有先后快慢之分,并非同步发展,因而,各文明进入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时间很不一致。不过,作为世界文明史,还是可以根据各文明生产力的发展变化情况,把世界文明划分为农业文明时代和工业文明时代。

农业文明时代,顾名思义就是农业是文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人类使用的能源是自然的可再生能源,作为重要生产力的人口受到土地资源等自然资源的制约,增长缓慢。广大的农业劳动者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却生活在社会底层。在统治形式上,主要采取帝王个人或贵族寡头的专政形式。在精神层面上,宗教是当时人类的主导意识,比如,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各文明思想意识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由于农业文明时代生产力发展缓慢,这个时代在各地都长达数千年。因此,也可以将农业文明分为初级农业文明阶段和发达农业文明阶段。

工业文明时代的生产力进步以蒸汽机的使用为标志。能源多为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不可再生能源,科学和技术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工业和商业逐渐取代农业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主要支柱。生产力的发展还使人类自身的生产限制减弱,人口增长的速度大大加快。过去以血统、门第为基础的社会分层逐渐消失,政治上的平等逐渐实现,但经济上的不平等仍然困扰着整个人类。科学和理性日益主宰人类的意识形态和思维方式,而宗教仍然是构成各文明不可忽视的内容和标志。工业文明也可分为工业文明的兴起和工业文明在全球的扩展。

**问:**您能谈一谈《世界文明史》与之前一些世界史著作的不同点吗?您在主持编纂《世界文明史》时,遇到过哪些困难和挑战?

**马克垚:**我觉得不同点,一个是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划分,另一个是强调文明间的交流。我对这本书并不是太满意,不过,高考试题中用过这本书里的内容,而且还有学校把这本书列为研究生考试的教材,据说销量还不错。我主要是主编,大部分的内容还是历史学系的各位老师写的,他们有自己的专长。写世界历史是一项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国外写世界史非常精彩的两位学者,一位是威廉·麦克尼尔,一位是费尔南·布罗代尔。他们读过很多书,有过目不忘的本领,虽然写的看似简单,但背后要有丰富的知识储备。

**问:**雷海宗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在2020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引起了国外学界的关注。您刚才提到的王马克就在德国的《历史杂志》上为其撰写了书评。在书评中,王马克提到雷海宗是20世纪第一批批判“西方中心论”的学者。在书评的最后一段王马克还指出了当下学术界交流的不平等,在中国市场上可以很轻松的找到像塞巴斯蒂安·康拉德(Sebastian Conrad)等学者的著作,在西方图书市场上却很难看到中国学者的著作。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您的许多研究不仅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而且也受到国际学界的重视,以您的个人经验,如何更好地实现与国际学术界的对话?



**马克垚:**雷海宗是非常有思想的,他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里面就提到中国文化是一个无兵的文化。你提到和国际学术界对话,我觉得首先注重的还是史料。有些苏联历史学家的基本功是很扎实的,比如像叶甫盖尼·阿列克谢耶维奇·科斯敏斯基(Evgeny Alekseevich Kosminsky),他利用百户区卷档的材料出版了《13世纪英国农业史研究》,这本书是俄文写的,后来被翻译成英文在英国出版。英国学者认为这本书是研究本国中古农业史的必读之作。一个苏联学者研究英国历史的书被英国学者奉为经典,这个就很能说明问题。史料是最关键的。

**问:**我记得斯特雷耶给科斯敏斯基这本书写过一个书评,高度评价了科斯敏斯基对待史料的态度,虽然斯特雷耶也提到科斯敏斯基的研究仍然有机械地看问题的缺陷,但他认为这并不能抹杀科斯敏斯基在英国中世纪农业史上的贡献。

**马克垚:**是的,史料是关键,但更重要的是理论创新。在坚实史料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再去谈理论方法的创新。现在国内中世纪史的研究在逐渐与国际学界对话,以前研究可能阅读英文资料就行,后来开始要懂对象国的语言。现在不仅是语言的问题了,还有材料。目前很多研究已不再单纯用出版的史料集,而是开始使用手稿,这说明我们的研究已经深入到研究的最底层了,并能基于史料研究提出中国学者的理论分析。

(访谈整理者张一博,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邮编:100101)

(责任编辑:崔瑾)

(责任校对:张舰戈)

## 《历史理论研究再出发：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成立五周年学术论文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12月出版,100.5万字。

该书是为庆祝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成立五周年而集结的学术论文集,展现了历史理论研究所学人五年来在历史理论研究方面取得的阶段性成果。该论文集分为上下两册,共收录历史理论研究所学人的代表性学术论文53篇,涉及“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历史理论概念与史学理论研究”“历史思潮与学术争鸣”“史学的传承发展与学术转型”“史学视域下的国家治理研究”等诸多领域,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理论研究所学人的学术研究与学术转向,也体现了历史理论研究所学人积极关注重大历史理论与现实问题、关注历史理论学术前沿与学科建设的使命和担当。